

[苏]伊凡·久巴著

国际主义还是 俄罗斯化？

商务印书馆





国际主义还是 俄罗斯化?

〔苏〕伊凡·久巴著

辛 华 译

林 汉 达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Ivan Dzyuba

Preface by Peter Archer, Barrister-at-Law,

MP Edited by M. Davies

Second Edition

内 部 读 物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苏〕伊凡·久巴著

辛 华译 林汉达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5/8 字数 210 千字

1972 年 10 月第 1 版 197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册

统一书号：3017·139 定价：1.05 元

出版说明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是苏共乌克兰族党员、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于1965年底写给乌克兰党中央的意见书。书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和列宁时期党中央的有关决议，列举了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资料，揭露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猖狂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乌克兰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同化、歧视和剥削的真相。但是，作者在某些问题上也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如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并提。

本书曾由乌克兰党中央印发给州党委书记内部传阅，征求意见。后来，乌克兰地下刊物曾转载，并流传到国外。今年年初，久巴终于为了七年前写的这本书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家协会，并于今年4月被苏修当局逮捕。

今年12月30日，是苏联各民族组成苏维埃国家联盟五十周年纪念日，苏修叛徒集团正大肆宣扬

他们的民族政策的所谓胜利,为此,我们将英国一家出版社 1970 年 10 月出版的英译本《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翻译出版,供研究苏联民族问题和苏联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情况的同志参考。

英译本中与书的内容关系不大的《缩写》、《索引》及关于勘正乌克兰文版与俄文版的《附录》三部分删去未译。为便于查找,对书末的《注释》重新编号,用黑体阿拉伯字标明在正文中。

1972 年 10 月

目 录

序 言	3
作者和本书介绍	12
致彼·叶·谢列斯特和弗·瓦·谢尔比茨基的信	20
引 论	35
一、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和接受批评的程度	55
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地位	62
三、为篡改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所准备的势力	72
四、各民族的前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各民族	83
五、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义务	100
六、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合作形式	108
七、“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幻影和作为苏联民族建设主要障碍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实质	114
1. 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117
2. 俄罗斯沙文主义把共和国联盟同“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俄罗斯”混为一谈	120

3. 俄罗斯沙文主义把苏联各民族创造的成果 归功于俄罗斯人	170
4. 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假国际 主义和假兄弟关系	172
5. 恐乌(克兰)症	183
6. 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主义	189
八、实际上的平等与形式上的平等	209
九、乌克兰化和对乌克兰化的镇压	232
十、俄罗斯化及其手段	243
1. 文化	251
2. 语言封锁	269
十一、使其他民族俄罗斯化和剥夺其他民 族的民族性违反俄罗斯人民的本身 利益	298
十二、理论脱离实际:故意撒谎,掩盖真相	306
十三、民族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普遍的 历史问题	344
十四、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是民族统一的发言人;它对乌克兰 民族所担负的责任	351
结 论	359
第二版后记	383
注 释	412

序 言

本材料所研究的是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领导人与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它的重要性并不限于这两个民族。因为这只是一个例子，借以说明由于不了解人民为什么要关心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因而使人民的愿望受到挫折，人民的自由选择受到束缚，并由此而产生了愤怒的情绪。

人以种族分成集团，这就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分成集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引起摩擦的一个潜在的根源。犹太人只想要建立一个国家，而阿拉伯人认为这样做就要牺牲已经居住在那里的人；在爱尔兰存在着疑虑和偏狭；戴高乐将军拒绝让法国人民参加一个欧洲组织，因为要法国承担义务而法国在其中却做不了主；威尔士、苏格兰和魁北克（加拿大东部）认为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挫折完全是由于处于少数民族地位所造成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为了共同安全的需要而产生本能的感情，而这种本能的感情，从人类开始群居的第一天

起，就由原始人坚持本族人的排他性所决定。

在联合王国，纪念人权年，主要是反对这种本能的、不近人情的敌视外国人的情绪，反对一种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归咎于外国人的偏见。这里说的是指寄居的外国人实际上并没有过问政府的事。反之，一个民族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历来受到教育，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领土，一旦发现自己是在受外国人控制的政府统治下生活，他们起来反抗，发动叛变，这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一个政府没有什么理由引起人民的不满，人民还是希望自己的政府保证它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乌克兰人民可以自己选择的话，他们是不是就不要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呢？这是没有证据的。诚然，本文的作者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写作的。但是，如果一个乌克兰人认为，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地位同乌克兰的地位有差别，因为前者看起来对于同莫斯科合作到什么程度起码有些选择的余地，而后者是在俄国革命和俄罗斯帝国解体后的动乱时期，于1923年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这么想，人们是会谅解他的。

当然，苏联宪法规定给各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但是没有办法去测验某一个加盟共和

国的人民是不是愿意行使这种权利。即使对苏联十分钦佩的人也不会假意地说，乌克兰人民在自由选举中有办法表示他们的选择自由。人们知道的是：在1917年11月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在乌克兰，投乌克兰社会主义候选人的票比投与莫斯科有联系的候选人的票多一倍。^①

利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传统来回避这种困难，这个办法是有诱惑力的。你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差别有什么了不起的？诚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的是把各国劳动人民联合起来的利益。作者使我们毫不怀疑他是反对沙文主义的。但是，有争议的是：谁是沙文主义者？是想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于其他民族的俄罗斯人呢，还是对此有意见的其他民族？

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不得不在一个有民族对立的世界里活动，并且不得不考虑如何使这种对立局面有助于达到、而不是妨碍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在被外国统治的民族中，人民的政治觉悟、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发展文化的关心，一向是和早期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民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39页。

族主义则已被证明是帝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

罗莎·卢森堡写道：“民族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好似空的器皿，各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一定的阶级，都注入自己特有的实质内容。”所以，她强调波兰工人与俄罗斯工人的联盟，超过强调波兰的自决原则。而列宁的看法是，只有各国人民确保有自决权，俄罗斯帝国中的革命力量才能联合起来。他们两人都不赞成日耳曼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后果，因为日耳曼民族主义与俾斯麦的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了。也许意味深长的是，列宁一方面认为，罗莎·卢森堡拒绝同波兰的民族主义结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说，在她写的《民族问题和自治》^①这篇文章（用波兰文写成）里，她把波兰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以致低估了乌克兰民族愿望的重要性。^②

或许，唯一的原则区别是列宁的原则区别，他把压迫民族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防御性的

① 《社会民主观》，克拉科夫，1908—1909。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13页。他说：“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又见罗莎·卢森堡著《俄国革命与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安阿波尔版，1961年，第52—54页。

民族主义区别开来。^①而作者无疑地表明，列宁的主张是：联邦政府必须保证给予联盟中的各民族以自决权。

联合国 1965 年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关于“多民族社会”讨论会（苏联代表在这个讨论会上起了积极作用）所作的结论说：“……（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大民族有责任认识到，鼓励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它希望这样做的话——主要的受益者毕竟还是（整个）国家。因此，一体化决不能意味着是掐死有关的少数民族。”

全苏维埃法学科学研究所 M·G·基里钦科教授为这次讨论会草拟的一篇背景材料也强调指出这一点。材料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苏维埃革命政府向“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者”发出的一封信：“你们的信仰，你们的风俗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构，以前曾受到沙皇当局压制，从今以后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了。自由地组织你们的民族生活吧，不受任何阻挠地组织起来吧。你们有权这样做。”^②对犹太人和哥萨克人，也发出了内容相似的文告。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第 631 页。

^② 这封信的日期是 1917 年 12 月 3 日（旧历 11 月 20 日），初次发表于 1917 年 11 月 24 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 17 期；全文见《苏联宪法史》，1936 年莫斯科版，第 35—37 页。

就在1967年11月6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E·巴格罗莫夫博士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有人说，社会主义侵蚀民族特点，把民族文化划一化。这种说法与现实不符。科学共产主义所宣传的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决不是取消各民族在形式、特征、风格和属性上的多样性，而是肯定这种多样性。简单一句话，我们所主张的统一是多样化中的统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也是我们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的准绳，正是以民族和国际间的融洽地相结合为基础的，因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具有民族自豪感和尊重民族传统的。凡是不热爱本国人民的，也不大可能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

这些意愿不光是关系到民间音乐和民族舞蹈，而且也关系到重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例如，大学入学考试是用俄语举行的，因此，虽然在乌克兰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六是乌克兰人，但是在乌克兰的一些大学里，俄罗斯人却比乌克兰人要多。

当然，这种使人不满的现象延续得越久，抱怨的人就越少。当一户人家——几乎觉察不到地，很可能要经过三代人——从使用乌克兰语，承认自己在

种族上是属于乌克兰人，而且对乌克兰语受歧视表示不满，逐渐转为使用俄语，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要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学俄语的父母，也许会有无可奈何的情绪，而他们的孩子就不大可能会这么想。尽管如作者所说，在许多青年人中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如果目前这种趋向继续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把那些不愿这么干的人，指责为一小撮坏家伙，说他们要保存一种垂死的文化。要真是这样，下几代的人为了避免受歧视，只好接受一体化了。趋炎附势的乌克兰人，为了自己的地位，宁愿放弃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当然，在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要说的话也是很多的。也可以说，在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吃亏在于自己的语言不为别国人民所知道，这不光是乌克兰人如此。世界各国人民在进入彼此了解和交谈的过程中，那些不那么广泛使用的语言，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一般地说，这并不限制人们在国内使用这些语言。

也许有人会说，某些有关城市生活的病症，作者归因于俄罗斯化，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是的，由于城市化，礼仪、道德似乎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家庭关系也不那么重要了，文化可以象罐头一样包装起

来供人享用了。这种变化过程，同农村的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只须读理查德·霍加特写的《识字之用途》^①一书中“邀访虚有其表的世界”一章，就可看到老一辈的城市工人阶级也是这么解体的。也可以说，这不能怪莫斯科。在欧洲其他地区，由于美国生活方式的输入，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向。

这场辩论涉及的另一问题，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优缺点。在地方上的人往往以为，由于中央当局距他们所统治的人的生活太远，对那里人民的愿望和生活方式没有同情的体会。而中央集权主义者则说，地方上的人死抱着落后的观念，只有中央集权可以保证制订一个进步的政策，并且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不论原来争论的问题是亚拉巴马州的种族歧视问题，恩菲耳德的综合教育问题，还是乌克兰对工业企业的管理问题，双方各执一词都是相仿的。

诚然，对这些问题是有进行辩论的余地的。作者主要的要求正是要进行辩论。在本文写作的前后，有许多想参加辩论的人被逮捕，受到秘密审讯和监禁。有些人已经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俄国进行的一

^① 1957年伦敦版。

种赤裸裸的侵略。逮捕、秘密审讯和监禁，加剧了这些人的疑虑和苦恼。只有当参加辩论的人自由宣传问题的解决办法，才能显出哪种解决办法最好。归根结底，有关的人民最有资格为自己作出选择。

因此，作者提议用自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自由包括：“实事求是地、公开地讨论民族问题的自由；给予民族选择的自由；让民族自己获得知识、自己提高觉悟和自己发展的自由。但是，最先决的也是最关键的则是进行讨论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

如果乌克兰的文化财富不让公开发表，这对苏联人民和世界都是一个损失。但是，如果象本文那样对辩论有所贡献而不准它在最有关的人们中间公开发表，那损失就更大了。因为这就等于说，在进行辩论之前，已经有人自称唯独他有权宣布真理在何方。如果不承认有进行自由辩论的权利，那么，讨论人权问题的前景就很渺茫了。

彼得·阿切尔于英国下院

1968年1月

作者和本书介绍

伊凡·久巴 1931 年 7 月 26 日生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顿巴斯煤矿区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 年他离开中学，考入顿涅茨克（当时叫斯大林诺）师范学院语言系。毕业后，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塔·谢甫琴科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其后，他在乌克兰国家文学出版社任编辑，负责《祖国》杂志（乌克兰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批评部门的工作，并且任《青年》出版社的文学顾问。

久巴的文学批评著作从 1950 年开始问世。在文学批评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为他的读者开创了学习文学的崭新途径。他以十分透彻的见解吸引着读者。他对定见从不苟同。他的作品对鼓舞苏维埃乌克兰文学的新趋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年轻一代作家和读者中，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仅在乌克兰各种刊物上，而且在俄罗斯的不少刊物上发表文章。还给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刊物写稿。他的作品英文译文，最先发表在莫斯科的